

#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

## 找到了拨乱反正的关键

1977年7月29日上午，我乘飞机到达武汉时，湖北省委领导同志在机场对我说，省委正在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希望我借这个机会同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见见面。我欣然接受，便从机场径直到洪山礼堂同与会同志们见了面。我说：“党中央要我从云南到湖北工作，我很高兴。‘文化大革命’中我有10年没有工作。革命实践很重要。到云南，向云南同志学习；到湖北，向湖北同志学习；和同志们一起把工作做得更好。”学习，除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外，还必须向实践学习。我初到湖北，情况不熟。所以，开始一段时间，我主要忙于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湖北深受其害，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以及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欢欣鼓舞。在省委领导下，揭发、批判、清查“四

人帮”及其在湖北的帮派体系的斗争广泛深入开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也在进行。但是，在调查中，在工作中，我越来越痛切地感到，拨乱反正的阻力很大。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彻底解决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和遗留问题，同时也迫切希望我们党能够更进一步彻底纠正“文革”中乃至“文革”前的严重的“左”的错误。他们的这个要求和希望是完全合理的，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却将“拨乱反正”局限在解决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之乱”的范围内，不仅不承认过去的“左”的错误，而且继续坚持“左”的错误。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到半年，他们就正式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见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正是这“两个凡是”的方针，严重地桎梏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成为彻底拨乱反正中的最大障碍。

拨乱反正中首先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类人员（干部、知识分子、工商业者、民主人士等等）的政策问题。“文革”中，湖北和全国一样，由于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帮派骨干分子的打击迫害，由于“左”的错误的影 响，发生了大量冤假错案，需要彻底平反。但是，由于“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平反工作十分艰难，不仅一些领导人和办案人员疑虑很多，各级党

委也感到束手束脚。在众多的冤假错案中，湖北的干部、群众呼声最高、要求最强烈的是为“七·二〇”事件彻底平反。“七·二〇”事件不平反，大是大非的界限不划清，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湖北的拨乱反正工作就难以进行。

平反冤假错案是向后看，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向前看，拨乱反正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建设的地位和方针、政策问题。当时虽然党中央已经提出了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但是华国锋同志仍然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得到解决。湖北的许多干部一面在抓生产，一面还在担心被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在经济政策上，华国锋同志也是继续执行“左”的政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农村提倡“穷过渡”。本来早在1961年毛主席主持制订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时，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错误，将公社核算、大队核算的体制改变成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得到了农村广大干部和农民的衷心拥护。可是1977年11月中央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之后发布的49号文件中却指出：“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并要求各级党委对此“采取积极态度”。当时还有这样一种怪论，说什么越穷越好过渡，刮起了一股“穷过渡”之风。这不仅不是拨乱反正，而是继续发展了“一大二公”的“左”的错误。湖北在1961年是最早提出和试行生产队核算的省份之一，有长期实践的经

验教训；所以，从省委到农村绝大多数基层组织都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抵制了“穷过渡”。当然，在工作中是相当为难的。在经济发展方针上，华国锋同志在 1977 年和 1978 年又一次重犯了“冒进”的错误，使刚刚开始恢复的国民经济又发生了严重的比例失调。这个问题在下面第四章中还要具体说，这里就不多写了。

以上这两个主要方面的情况，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情况，都明显地反映出“两个凡是”与“拨乱反正”之间的尖锐矛盾。邓小平同志在即将重新出来工作前，于 1977 年 4 月写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一个精辟的科学论断，即：“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经历了拨乱反正中的困难，我们才懂得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要提出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不仅提出了科学论断，而且带头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予以贯彻。他重新出来工作、恢复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不久，就亲自主持教育和科学两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强调“要把毛泽东同志在教育方面的主导思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实事求是地、理直气壮地肯定教育、科学战线“文革”前 17 年工作的主导方面是红线，坚决推翻了“四人帮”关于“黑线专政”的所谓“两个估计”，使这两条战线得到了彻底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的科学论断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他身

体力行的实践，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越来越感到“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是两条尖锐对立的思想路线，坚决摒弃“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彻底拨乱反正的关键。在酝酿写这本回忆录的过程中，有同志问我，1978年9月省委怎样会下决心开一个千人大会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我回答说，这当然有很多因素，包括省委常委的共识，但是最根本的一条，还是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和实践给我们的启示。

## 下决心开了个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千人大会

1978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提出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很感兴趣。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当天，新华社转发了此文。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5月13日，《湖北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文章说，我们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问题，

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要研究现实的确切的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文章强调，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

我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读了这篇文章，都认为文章写得很好，有非常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虽然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但是一看文章就明白，文章所针对的不仅是林彪、“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而且还针对着“两个凡是”这道新的精神枷锁。文章所阐述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问题，也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然而却是一个长期以来被搞得混乱不堪、亟待澄清的大问题。回顾邓小平同志关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论述，联系前段我在湖北调查研究了解的情况和在工作中碰到的思想阻力，深感这篇文章抓住了彻底拨乱反正的根本。我们省委衷心赞同和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

随后，从北京传来一些消息，说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严厉批评了这篇文章，说文章的要害是指毛泽东思想为“枷锁”、“禁区”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行动上“砍旗”的，还指责发表这篇文章是“没有党性”，犯了方向性错误。我省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还带回话来，说是中央宣传部领导同志特别叮嘱要向省委汇报的，说对《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接着，中央主要领导人还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和一些省市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红旗》杂志要“一花独放”；就是“不表态”。在以后的五个月中，《红旗》果然没有发表一篇有关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

我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对《光明日报》这篇文章“鉴别”了一番，还是认为文章是“香花”，不是“毒草”，认为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上纲上线”的严厉批评是不对的。文章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是“砍旗”的。省委要求省委宣传部先组织理论工作者座谈讨论，并注意搜集各方面的反映。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精辟阐述了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观点，同时还尖锐地批评了反对此文观点。邓小平同志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提出了“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的战斗任务和要求。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当时就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省委常委开会认真学习了邓小平同志讲话，联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以来的情况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认为，当前的确仍然存在着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种“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根本观点的思潮。这种思潮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刚刚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实事求是，凭事实讲话，敢于提出和研究新问题的优良作风，站在对立面。这反映了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这场斗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这场讨论。大家还认为要把林彪“四人帮”在理论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纠正过来，正本清源，澄清是非，不是光靠领导机关发个指示、领导人作个报告就能解决的，还要靠群众参与来解决，要用民主的办法、讨论的办法来解决，因此要组织干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省委常委决定，省委宣传部要立即全面部署这项工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焦德秀同志和宣传战线的同志们认真贯彻了省委的要求，在整个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期间，积极主动地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参谋、助手作用。

省委宣传部根据省委指示，提出了在省直部、办、委、局各机关，在大专院校，在工矿企业，以及在全省地、市、县开展学习讨论的计划，并召开会议作了部署。这次会议还明确提出省、地、市报纸在这场讨论中要主动参战，发挥积极作用。为了推动这场讨论，省直机关在1978年8月31日举行了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报告会。会上，省委党校的

同志介绍了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在北京召开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的情况，省委副书记王群同志讲话，再次强调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这些部署和动员，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省初步启动。但是，真正积极组织讨论的地区和单位还不多，干部中还有不少人疑虑重重。主要的疑虑有二个，一是划不清“真高举”和“假高举”的界限，担心这场讨论会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会损害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二是认为对这场讨论“中央没有文件，《红旗》杂志没有表态”，怕“跟”得不对，犯错误。这些情况恰恰说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是多么必要和迫切，是多么需要敢于冲破“禁区”的胆识和勇气。

正在这个时候，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吉林时的讲话中直接地指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他说：“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说：“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邓小平同志的谈话，使我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

进一步提高了认识，鼓舞了勇气，深感要冲破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态，把真理标准问题这场讨论真正开展起来，还需要有一个大的有力的推动。我们采取具体措施，就是以省委名义召开一次大型的全省理论工作会议。

省委理论工作会议于 1978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5 日在武汉举行。这次会议有以下三个明显特点：

第一，会议主题集中，旗帜鲜明。会议一开始就明确宣布，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目的是为了真正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弄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反对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不顾实际情况照抄照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推动我们的各项工作，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会议特别强调，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不仅是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带根本性的现实问题。这场讨论关系到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

第二，会议的规模大，时间长，层次高。这次会议共开了 13 天，参加会议的有 1000 多人，是湖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理论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各地、市、县委和武汉市各区委宣传部长和党校校长，各大型厂矿企业、大专院校的负责同志，省直部、办、委、局、各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武汉地区的报纸、刊物、出版、广播等新闻出版单位的负责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各专业学会的理论工作者，在省委党校干部班、理论班学习的全体学

员也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此外，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全省财贸工作会议的全体同志，也出席了理论工作会议的开幕式和几次重要的报告会。

第三，邀请北京几位理论工作者到会作专题报告，推动思想解放。我们以省委名义，也以我个人名义，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邢贲思、《人民日报》社汪子嵩、《光明日报》社马沛文等三位同志专程来武汉，为我省理论工作会议作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报告。他们都是站在这场讨论前列的理论工作者。他们在报告中介绍了这场讨论的来龙去脉和所遇到的思想上政治上的阻力，讲了这场讨论的必然性、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他们的报告针对性很强，科学地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批驳了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回答了人们思想上许多疑难问题，也涉及了如何认识和对待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以及如何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问题。他们的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力地促进了到会同志的思想解放。

我在会上代表省委作了长篇讲话。这篇讲话先在省委常委会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修改（各地、市委书记也参加了），形成了共识。因为这篇讲话是一级地方党委向下的正式讲话，所以我在常委会讨论时向大家说明：有意识不讲两个“凡是”，不讲“三七开”，不讲“七·二〇”事件。这篇讲话突出强调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揭露了林彪、“四人帮”鼓吹“句句照办”，提倡偶像崇拜，不许独立思考，把人们的思想搞僵化了。这一流毒很深，至今还影响一些同志在想

问题、办事情的时候，不能或不敢实事求是。明确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要求大家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和发扬被破坏了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传统作风。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来一个思想革命；不断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放眼全国全世界，向群众学习，向先进学习。同时，还针对拨乱反正中的阻力，表明了省委的原则立场：“对前 17 年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经验，要敢于肯定，敢于坚持”；“只要是冤案、假案、错案，都应该昭雪平反。”

在这次全省理论工作会议上，省委强调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和“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鼓励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小组讨论、大会发言都很热烈。大家认为，这次会议打开了封闭多年的思想的门窗，感觉到了春风拂面。粉碎“四人帮”，掀掉了压在头上的大石头，人们都甩开膀子大干，迈开步子大上，但又感到思想仍然被束缚，手脚依然被捆绑。在拨乱反正中，往往碰到一些“禁区”不敢触犯，怕被戴上“反对毛泽东思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帽子，想恢复“文革”前一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有效的政策和做法，怕被说成是“复辟”、“回潮”，至于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探索新道路新做法，更是不敢尝试，怕被说成是“修正主义”。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实践”这个最高权威，千秋功过就好评说了，是与非就泾渭分明了。坚持实践这一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就抓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把金钥匙，就抓住了拨乱反正的根本，就抓住了开拓创新、敢干敢闯的关键。

要迅速在全省广泛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键是各级党委，特别是各级党委主要领导同志，要旗帜鲜明，态度明朗，真正认识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解除顾虑，积极地认真地领导好这场讨论。为此，省委特别请正在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各地市委书记参加理论工作会议，听了会上的几个主要报告。理论工作会议上还特别安排前段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较好的武汉市、荆州地区和武汉钢铁公司的党委负责同志作大会发言，介绍了经验。

召开千人理论工作会议，专题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在全省产生了震动性效应。在各级党委的重视和领导之下，在全省城乡较快地形成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一次高潮，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进了各方面的工作。千人理论工作会议以后，我陪中央领导同志到二汽、十堰、郧阳视察时，专门听了二汽党委关于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汇报。这一讨论由二汽党委第一书记饶斌同志亲自部署、检查，党委书记黄正夏、副书记温瑞生、二汽总工程师孟少农等领导同志带头登台发言。在讨论中，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十堰二汽建设和生产中的实际问题，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说：“四人帮”横行时，在建厂初期没有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强令出“政治车”，谁反对谁就靠边站，搞得人人自危，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还批判二汽建设中采用机械化、自动化的设计，说什么“搞流水线、

自动化，就是不要思想革命化”，乱砍硬压设计指标，结果，不仅耽误了建设速度，而且造成了一些无法补救的损失和隐患；还批判“质量第一”，说什么“讲质量第一，把‘四个第一’放在哪里？”结果造成大量的工程返工，多花费国家资金 4800 万元。职工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经济建设方针的唯一标准。通过这一讨论，林彪、“四人帮”设置的思想“禁区”开始被突破，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扫除了思想障碍。我听了汇报后，对二汽党委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湖北日报》专门介绍了他们在讨论中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肃清流毒、正本清源的经验。

当然，省委也清醒地注意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展很不平衡，关键依然是领导问题。有的地方的党委领导同志参加全省理论工作会议，听了北京来的几位理论家的报告后，感到回去后不好办。他们说，这些人讲的既不是中央的指示，又没有中央的文件，仅仅报上有几篇文章，据此就搞大讨论，对吗？行吗？由于领导上存在这样的疑虑，在他们领导的地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自然就难以搞起来。还有的人听了北京理论家的报告很反感，甚至骂那几位理论工作者。个别人甚至把这次省委理论工作会议比作“苏共二十大”，把几位理论家的报告比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省委认真分析了这些反映，认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不遇到阻力，不可能把所有人的思想从长期僵化状态中一下子都解放出来，出现一些反对的意见，一些人有疑虑，并不奇怪。我们坚信这次理论工作会议的方向是正确

的，决心把这场大讨论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

## 深入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湖北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按照原来的计划，三中全会的主题只是经济问题。但在会前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坚持提出了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为一些重大历史冤案（例如：彭德怀同志的冤案；1976年4月5日北京“天安门事件”等）平反，邓小平同志并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为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指导思想。因此，这次全会突破了原来的议题，开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历史性会议。同时，这次会议也在实际上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所以说，1978年底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又一座伟大的里程碑。我有幸出席这次对中国历史进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以及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伟大成就，使我深深感到党的生机的恢复，党的力量的伟大，党的前途的辉煌。

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的讨论 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就从根本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会毅然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左”的错误方针，决定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党的工作着重点由抓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转向经济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深刻的历史性转变。省委在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时，主要着力抓工作重点的转移。1979年元月，省委召开三届十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会上充分发扬民主，解决湖北在“文革”中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同时，省委还撤销了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所发的错误文件和省委负责同志的讲话，责任由省委承担，下面执行的同志没有责任，不要层层去担担子。在此基础上，省委强调不要再为已经过去的事情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要顾全大局，向前看，团结起来，集中精力搞好工作重点的转移，搞好湖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由于有1978年9月以来全省范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打下的思想基础，绝大多数同志对三中全会精神是热烈拥护的，对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向现代化建设是高兴的，行动是积极的。但是，在各地具体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也反映出了一些思想认识问题。省委扩大会议以后，省委副书记王群同志到襄阳地区调查研究。他给我

打电话说，现在下面有“三好三怕”：一是认为工作重点转移好，但怕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又犯右倾错误；二是认为现在农村政策好，但怕搞不长久，怕不能兑现；三是认为发扬民主好，但怕无政府主义又来了。王群同志反映的情况有相当的代表性，各地都有类似反映，有的甚至更突出。例如，有人认为：“三中全会损了旗，重点转移丢了纲，落实政策宽无边，解放思想过了头，发扬民主乱了套”。有人提问：“现在做的就是过去批的，现在批的就是过去做的，不知现在对，还是过去对？”有的人说：“过去讲阶级斗争为纲，现在以四化为纲，千个师傅千个法，搞得我们没有法。”我们分析了对三中全会的这些反映，认为虽然有些话很错误，但一般来说都还是思想认识问题；虽然模糊认识、错误看法反映的面比较广，但仍然只是干部、群众思想的支流，主流还是拥护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些人的思想，用一句歇后语来概括还是比较恰当的，就是“小孩放炮竹——又喜又怕”。一些人的“怕”，集中到一点就是怕右了。人们对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是高兴的，但是对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又不放心，有一种“工作无纲，心里发慌”的感觉。实际上这是对三中全会的这一重大决策的正确性没有把握，甚至有怀疑，担心是“向右转”。由于有这个担心，因而又担心“转不长”，担心会出现反复，又“转回来”。这种情况说明，不是“解放思想过了头”，而是一些人的头脑仍然受“左”的枷锁束缚。经过1978年9月以来的大讨论，一般都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但是具体判断是与非的时候，又